

“沪滨屹立东南冠”

从茂飞设计的复旦校园说起

王启元

一百年前，复旦大学迁址江湾，从此“沪滨屹立东南冠”。其设计者是参与了20世纪中国多座大学校园设计的建筑师茂飞。然而后来两次淞沪抗战都从上海东北角发起，早年的校园已悉数遭毁。

今天知名的综合性大学复旦大学，是由两所民国国立大学于上世纪末合并而来，一所是国立上医，一所是国立复旦；其中，上医自1927年建校便是国立，而复旦迟至抗战中期在重庆北碚时期才转成国立。1946年抗战胜利后，复旦渝校回沪，与战时留沪的沪校重新合一，回到战前迁出的地方：上海特别市的江湾（今复旦大学邯郸校区）重新办学。自北洋政府时期的1922年起，除“八一三”淞沪会战一度内迁之外，百年来复旦一直在这片曾经虬江分水之处讲文论学，作育国士，弦歌不辍。来到江湾校址之前，复旦曾在吴淞提镇行轅（今约宝山区吴淞中学校园内）及徐家汇李公祠（今长宁区复旦中学）甚至无锡李公祠（李鸿章弟鹤章祠堂）内相继办学，又由于不同原因相继改变校址。直到1918年，时任校长选中江湾这块地，复旦终于不必再主动迁徙，这里也成为了复旦的永久校址。

校长遇见同学设计师

1917年，尚在李公祠的复旦升格为大学，1918年便易地江湾，因而成为近代江湾地区最早迁入的新式高等学堂。步复旦之后，国立劳动大学、民国上海大学、私立立达学园、私立文治大学、两江女子师范等学校，陆续从上海各个角落迁来江湾；原因之一，便是这里交通方便，有淞沪铁路江湾站可达。淞沪铁路沿线江湾至吴淞段，也成为民国上海最重要的“大学线”。

初来乍到，一切殊为简陋。时任校长李登辉（1872—1947）在校园建设上也颇有自己的想法。此时，一位对日后中国学校建筑影响极大的美国设计师，把业务拓展到中国，不仅为李登辉校长带去了复旦校园的设计方案，还为当时的中国新式学堂开启了全新的面貌。这位设计师名叫Henry Killam Murphy（亨利·基拉姆·墨菲），后因在中国业务频繁，为自己定了一个中文字：茂飞。

学界对茂飞的研究，自郭伟杰（Jefrey W. Cody）1989年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以后以著书形式于2001年出版，中译本《筑业中国》，文化发展出版社，2022）以来，相关成果颇丰。茂飞最重要的杰作：清华与北大（即燕大旧址）的校园建筑研究，便多有围绕其设计展开。而他在华的最早作品雅礼大学（今湘雅医院、医学院），及被誉为其最佳作品的金陵女大（今南京师大随园校区）的相关研究，同样丰富。他所设计的沪江大学建筑，即今上海理工校园内，还塑有他的全身像。不过总体来说，茂飞及其作品在今天的文化叙事中知名度有限。且相比茂飞大部分作品尚存之天地、而不为人熟知的现实，那件在战争中被摧毁的作品，则尤其值得标出，那就是位于民国江湾的复旦大学校园。

复旦大学虽不是茂飞最早设计的校园项目，却是他设计过的建校最早、同



茂飞绘复旦大学校园设计图

时也是教会色彩最浓的一所学校。茂飞曾说自己与复旦之间有着不一样的因缘。复旦由原震旦学院创办人、教育家马相伯先生（1840—1939）创办于1905年，早期为一所“公学”，由地方财政与士绅注资办学，校址在吴淞提镇行轅。辛亥革命后为光复军所占，马相伯出面借下徐家汇李公祠，作为复旦公学第二片校舍。1913年初，新任校长南洋华侨李登辉谋求将复旦由公学升格为私立大学，并寻觅新校址。1918年1月，他亲下南洋募款建校，半年而回，所得款项于同年购得虬江故道分水处七十亩荒地。南洋募款的经费中似也包含了茂飞的设计费。郭伟杰在《筑业中国》一书中用茂飞档案及当时中西报章记载，发现茂飞与复旦结缘颇为偶然与迅疾。

1918年夏，茂飞从长沙视察雅礼大学项目后来到上海，租住今外滩有利大厦顶层作为办公室，顺便接受了《Shanghai Gazette》（《上海新报》）的采访。这次采访成功吸引到多方的关注。首先吸引到了美国前驻沪总领事查尔斯·邓迪，邓迪又将其介绍给时任总领事铂金斯，铂金斯便安排了茂飞与李登辉校长的见面。另一方面，复旦管理层也通过新报采访，找到茂飞，希望其参与校园设计。更有趣的是，茂飞在与李校长见面后发现，二人不仅同为耶鲁毕业生，而且是1899年同届的同学，不过二人在组盟文时并不认识，二十年后才在大洋彼岸的江湾见上了面。茂飞档案中记载了他来江湾见李登辉：

李博士邀请我同庶务长叶秉孚一道参观了江湾基地，我也简单介绍了自己在东亚其他的大学校园项目，李校长当即表示把复旦新校园的设计交给我。

由于复旦当时所在校舍徐家汇李公祠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李校长、叶庶务长一致认为，新校园建筑也应是中国传统形制，又必须满足防火要求，当用钢筋混凝土建材，茂飞也表示认同。茂飞在复旦这片基址虽然没有看到山峦河湖的景致，但鉴于基址平整，完全可以在此建起一众环绕式的“大书院”建筑群。他预想的中轴顶端是八角形大礼堂，设在校门边上，那将是一座气势非常恢弘的校园。茂飞这段关于复旦校园项目的记载，出自他致搭档丹纳的信中。他的复旦校园设计图纸，现在存有一版，与信中描绘基本一致，整个校园建筑围绕着中心草坪，八角形礼堂设置在一段。这张图的方位解读历来不准确，其实从大礼堂与校园边上河流的走向来看，图右上方为南面，右上方河流分支又即虬江主航道分水，而江湾复旦校园就在这处分水的西北侧，李登辉募款所得七十亩地便是这片“水边泽国”。

入宫”之后，“留心后房，拟外百官，备位置内职”的宋明帝刘彧或夺帝位之前，她入宫中的身份并不明朗，直到“宋明帝世，用为宫中职俦”。按照《金楼子·箴戒篇》的说法，她所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准左仆射，铨人士”（《南齐书·皇后传附韩兰英》），正好崭露头角。“令晖歌诗，往往崭绝清巧”，而“兰英缙密”——两位传世作品都极少，但以钟嵘落字观之，前者五言诗主要创作风格可能介乎其兄与谢客之间，后者则更近颜延之。

韩兰英，吴郡人，不知原籍何县。她的家世、婚姻家庭状况等，都未留下记载，出身应属寒素，与鲍氏兄妹相若。不过，相较有兄长可以文名交映的鲍令晖，韩兰英事迹仅见于《南齐书》与萧绎《金楼子》寥寥数语，作品传世仅五言短诗一首；文集本有四卷，但《隋书·经籍志》已著录其亡佚。在文学史上，她是当时“才女”的一个典型，但限于以上种种，在被“看见”之后，较难获得更加深入的解析。

依《南齐书》，韩兰英的人生可划为四个阶段：入宫前、宋孝武帝朝入宫以后、宋明帝朝担任女官以后、齐武帝朝担任后宫博士之后。

献《中兴赋》得到宋孝武帝刘骏赏识之前，她的人生没有故事。“被赏

学林

限于文献，我们只知道1918年定下茂飞开始设计复旦校园，1920年2月便有一版设计图；1922年春，大学部师生正式迁入新校园。我们还知道，初迁江湾的复旦因囊中羞涩，并未遵循茂飞设计的图纸纸建校园建筑，今天存世相辉堂草坪周边建筑群风格，与之并不一致。



茂飞绘复旦大学校园设计图

限于文献，我们只知道1918年定下茂飞开始设计复旦校园，1920年2月便有一版设计图；1922年春，大学部师生正式迁入新校园。我们还知道，初迁江湾的复旦因囊中羞涩，并未遵循茂飞设计的图纸纸建校园建筑，今天存世相辉堂草坪周边建筑群风格，与之并不一致。

最初的“三大件”

因私立大学经费紧张，茂飞的大部分设想并没有实现。校志记载，复旦校园于1920年冬开工，一年多时间里，仅建成教室、办公室和宿舍三幢大楼，为复旦江湾校园最早的建筑“三大件”。此后，学校便正式迁往今址，开始办学。最早的复旦大学校园，中心为大草坪，中央轴线最南端，是当年校园的核心建筑奕住堂；轴线最北，早期是学生宿舍。而轴线西侧，有校园里最恢宏的建筑简公堂。中央草坪四周，在茂飞设计之后的十年间又增添不少新建筑。

前述李校长1918年下南洋募款足以购买江湾地皮，但不够建筑经费，所以设计方案虽早已谈妥，施工则未见。这时复旦校友们各显神通，尤其在沪做寓公的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拉来复旦最早的“三大件”的大部分赞助。其中原大礼堂位置建起了校办公大楼，以赞助人黄奕住的名字命名为“奕住堂”。

荷属东印度糖王、银行家黄奕住（Oei Tj Tjoe，1868—1945），福建南安人，曾是南洋首富。1920年，功成名就的黄奕住因念侨民苦异国苛法，而思为故乡国强，遂前往上海，与史量才等共商于上海建中南银行，次年建成。也是这个时间点，唐绍仪为李登辉介绍了黄奕住，并向其化缘建校舍，黄氏欣然答应，并在之后很长时间里都担任复旦董会成员。起初，奕住堂是用作校办公大楼，1929年又添建两翼。后为纪念前教务长薛仙舟（1878—1927），曾改名仙舟图书馆。抗战中，奕住堂东侧屋顶被日军炮弹掀去一角，战后修复，解放后一度是复旦大学图书馆，今为校史馆。

中央草坪的西北侧为简公堂，曾是复旦校园中最大的单体建筑，造型立面基本按照茂飞的设计，拥有宫殿式的大屋顶，飞檐鸣吻，为当时的教学楼。简公堂的捐资者，是近代沪上知名企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简氏兄弟籍贯广东，于虹口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内挤外压的经营环境中，成为当时唯一可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的民族卷烟企业。黄奕住与简氏兄弟大约共捐十万

元。学生宿舍（后称第一宿舍）与奕住堂、简公堂同时落成。

中央草坪西侧建筑因为经费问题，不仅落成较晚，且基本放弃了茂飞当年的设计方案。1925年，复旦得到著名实业家、潮阳人郭子彬五万元捐助，建起了子彬院。郭子彬的堂侄郭任远，为复旦当时的代理校长，著名心理学家；堂叔顺便还捐资资助侄儿，为复旦开办了心理学系。子彬院建筑为典型乡村别墅式风格，与周边仿中式建筑风格不同；建筑的选位与朝向，亦偏移茂飞设计的轴线。至1927年，复旦开始招收女生。荷属东印度商人陈性初，捐白银二万两，兴建复旦大学女生宿舍。宿舍为二层中式风格建筑，位于中央草坪东侧。学校专设女生指导，管理女生生活与学业，毛彦文留美归国后一度来此任职；也正是在这里的大厅，民国前总理熊希龄向毛氏表白，一度震动复旦，最终熊总理如愿娶得美人归。

大约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前，复旦中心草坪西侧、简公堂南北及第一宿舍以东，陆续添置三幢新楼（即后来100、300、500号楼），而在500号楼以北，还曾建有体育场。建筑群中最后一幢知名建筑，为校园西南角的卫生院。1931年6月，李登辉校长的夫人汤佩琳去世，新建卫生院便被命名为佩琳院。半年后沪上战事骤起，复旦校园遭受灭顶之灾。近代两次淞沪抗战都从上海东北角发起，复旦成为重灾区，茂飞时代设计的整体校园悉数遭毁。当时的第一宿舍、第二宿舍、体育馆等建筑，在战火中被完全炸毁，其余校舍亦受损严重。1937年10月，日军占领复旦校园，简公堂遭遭炮火击毁，砖瓦横梁，散落满地。汪伪政府曾对劫后的若干建筑做过一定修缮，有些甚至沿用到本世纪，但已不复茂飞设计旧观。整个校园中，唯有“子彬院”得以幸免，保留至今。

复校后的1947年，时任校长章益向各地校友募集三十余两黄金，献给为复旦倾其所有的恩师李登辉，作为颐养金，李校长知道后坚拒。后经协商，决定扩大募捐，用这笔钱在原第一宿舍址上修建登辉堂。八十年代，为纪念复旦创校两位功勋校长：马相伯与李登辉，改名为相辉堂。这座中式礼堂建筑屡经翻修，伫立在当年茂飞轴线正北，今天已然成为复旦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 * *

茂飞在1935年便因年事渐高离开中国，他的名字也很快被国人淡忘；不过他留下的建筑理念与遗产，仍令人在意。茂飞设计雅礼大学、即日后的麻园岭湘雅医学院建筑群时，雅礼会的中方负责人、同时也是其友教师弟，对茂飞的“适应性建筑”的设计颇为留心；直到他后来亲自主持一座新校舍的建设，同样使用了这一中西融合的建筑风格，向自己参与创建的湘雅医学院致敬——他就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医学教育家颜福庆。1936年，颜福庆在枫林桥主持新上医与中山医院建筑群建设时，便充分吸收了茂飞的建筑风格，甚至1956年再次主持上医西苑建筑群时，仍大量采用“适应性建筑”风格建设布局。

回到江湾复旦校园。1952年院系调整后，复旦办学规模扩大，更新校园的需求日增。在时任校长陈望道先生主持下，复旦校园中轴线自茂飞设计线东移三百余米，以今邯郸校区正门为轴线，重新建设新复旦校园。校园中心为大草坪与雕像，环绕草坪东西依次为两座教学楼、生物楼、图书馆及化学楼，轴线最北为物理楼单体建筑，宿舍与体育设施，则跨过当时国福路（今校园内段已废）继续向东发展。新复旦校园格局在复旦建校六十周年、1965年时基本完成，大部分建筑皆沿用至今，这一格局与茂飞设计中大院式的校园不谋而合。

（本文写作得到复旦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钱益民、上海交大历史建筑勘察设计研究院建筑师冯立的帮助，一致致谢）

（作者为复旦大学考古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

1976年，父亲望道先生送了一本当年版的《修辞学发凡》给我，并在内页题写了“振新弟弟存览”。在家里我最小，上面还有两个姊姊，所以父亲平时就叫我弟弟。几十年来，我多次翻看过此书，也时有感悟。今再次翻看并作整理，略略写出，以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九十年。

《修辞学发凡》一书是父亲1932年写成的，至今仍在出版。中国修辞学界公认该书为“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石”“现代修辞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民国时期，各大学以它为教材，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定其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大学生必读的一百本参考书之一。郑子瑜、张志公、倪宝元、吴士文等学者都说，自己是读了《修辞学发凡》才走上修辞学研究道路的。

书中的修辞学体系和研究方法也影响了后来的许多著作。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后期，我国台湾地区翻印了《修辞学发凡》为台湾学生书局首先翻印（为避开台当局检查，更名为《修辞学释例》）。七十年代初，台湾“中央”大学徐芹庭撰写了《修辞学发微》（台湾中华书局印行）。有学者指出：“该书虽然是同时参阅陈望道、杨树达、陈介白所著修辞学专著写成的，但以采用《修辞学发凡》的说法最多。”1975年，台湾师范大学黄庆萱《修辞学》出版，由台北三民书局印行，颇为畅销。其内容探析弘扬《修辞学发凡》可谓最晚，引用《修辞学发凡》的品格而阐发理论也可谓最优（均见蔡宗阳“《修辞学发凡》对台湾修辞学界的影响”）。

为什么一本书能经受住几十年时间的考验而一版再版，或可参看刘大白先生的“初版序序”中如下一段描述：

“陈先生底着成此书，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这是我在这十余年中所目睹的。……往往为了处理一种品格，搜求一个例证，整夜地不睡觉；有时候，从一种笔记书上发现了引用的可以做例证的一句或一段文字，因为要明白它底上下文，或者要证明著者所引的有没有错误，于是去寻它它所从出的原书。……要是此书是一部大部头的书，或者是在某种从书中而不能抽买的，他也不惜重价，仅仅为了一个例证，而把全部书买了来。到了借无可借买无可买的时候，他还要向相识的友人，多方面地询问，一定要达到搜求到此书的目的为止。”

刘大白先生还提到，父亲在著书的这十多年来，“因为见解的进步，已经把稿子换了好几遍”。几易其稿的结果，是“不但品格的纲领组织和旧稿不同，就是关于修辞学的根本观念，也和旧稿不同，完全换了以语言为本位”。

复旦大学乐嗣炳教授回忆当时父亲会“为了一种提法，一个例句，同刘大白和我每次讨论都是几个钟头，有时直到深夜”，而且还花很多时间研究修辞学有关的各种科学。乐嗣炳说，先后收到父亲五次油印稿本：“他写成稿本，就把它当作复旦大学和上海大学中文系的讲义，把油印稿本赠同业，征求意见。”复旦大学吴文祺教授也回忆：“发现了更好的例证，他毫不犹豫地将原先费力收集到的例证替换。十几年中更换了多少回，已经无法统计了。最后用到了书去的例句，只是他收集的千百个例句中的一小部分。”父亲所依据的原则，是“就所搜集的许多例中择出比较熟悉，比较单纯，又比较有意思而容易了解的，来做例证”。可谓反复提纯。

成书前，父亲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修改，书出版后，一旦发现有不全、不准确的地方，他一定会寻根究底地查阅资料，待再版时作补充和订正。

从1954年、1962年和1975年的初版后记、付印题记、重印后记和前言中，可略见内容的变化、印数及写作意图。

据《民国总书目》的记载，在1932至1945年十三年间，《修辞学发凡》共

出版九十年。

《修辞学发凡》的发行量，民国时期的已无从考证，但从作者1944年写的“付印题记”中得知：“本书曾在抗战前出过八版，抗战以来则在似乎出不了的状况中搁置了好多年，各处旧书店把它当作绝版书卖，价格高到六七百元乃至千元一本。”可见被受读者的喜爱。1950至2021年间的不完全发行量统计数为33万余册。

书分十二篇。初版时，父亲自述“第一第二第三及第十第十二等五篇是这次的新稿，其余七篇是由旧稿整理修改而成”。旧稿，即指作者在复旦大学教书时写的油印稿。1932年成书时“辟格增了十格，材料也加了三分之一以上”。新稿“系根据年来研究文艺理论，社会意识，以及其他一切关连学科所得”。而《修辞学发凡》每次重印，父亲都会从头校读，稍加修正。所“略略加笔”处，是为“使本书所说与我最近所见更加协调”。他不懈更新，背后有使命动力：“年来被邀从事新闻教育，对于时务见识益多，越见中国语文革新常与中国发奋图强的历史相辉映。过去如此，将来也必如此。”

上世纪三十年代单路蓝缕的初版中，父亲“想将修辞学的经路略画清，又将若干不切实际的本来定见带便指破”。1962年版重印时，更表示在阐述修辞现象之外，“还想对于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饰、白话文不能修饰，等等，运动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书中有些地方论争的气氛很重，便是如此。”父亲在这里展现出学者本色，因为他知道，“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弃所忽略的影响。何况修辞学，它的成事成例原本是日在进展的。”

在“结语”中，他尤其强调“进展”：“所以修辞学的述说，即使切实到了极点，美备到了极点……要超越它所述说，并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能够提出新例证，推出新条理，能够开拓新境界。”父亲身上也有着他同代人共享的一种继往开来的豪迈之气：“我们生在现代，固然没有墨守陈例旧说的义务，可是我们实有采取古今所有成就来作我们新事业的始基的权利。”九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感发人心。

“付印题记”中得知：“本书曾在抗战前出过八版，抗战以来则在似乎出不了的状况中搁置了好多年，各处旧书店把它当作绝版书卖，价格高到六七百元乃至千元一本。”可见被受读者的喜爱。1950至2021年间的不完全发行量统计数为33万余册。

书分十二篇。初版时，父亲自述“第一第二第三及第十第十二等五篇是这次的新稿，其余七篇是由旧稿整理修改而成”。旧稿，即指作者在复旦大学教书时写的油印稿。1932年成书时“辟格增了十格，材料也加了三分之一以上”。新稿“系根据年来研究文艺理论，社会意识，以及其他一切关连学科所得”。而《修辞学发凡》每次重印，父亲都会从头校读，稍加修正。所“略略加笔”处，是为“使本书所说与我最近所见更加协调”。他不懈更新，背后有使命动力：“年来被邀从事新闻教育，对于时务见识益多，越见中国语文革新常与中国发奋图强的历史相辉映。过去如此，将来也必如此。”

上世纪三十年代单路蓝缕的初版中，父亲“想将修辞学的经路略画清，又将若干不切实际的本来定见带便指破”。1962年版重印时，更表示在阐述修辞现象之外，“还想对于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饰、白话文不能修饰，等等，运动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书中有些地方论争的气氛很重，便是如此。”父亲在这里展现出学者本色，因为他知道，“一切科学都不能不是时代的，至少也要受时代所要求所注重，及所鄙弃所忽略的影响。何况修辞学，它的成事成例原本是日在进展的。”

在“结语”中，他尤其强调“进展”：“所以修辞学的述说，即使切实到了极点，美备到了极点……要超越它所述说，并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能够提出新例证，推出新条理，能够开拓新境界。”父亲身上也有着他同代人共享的一种继往开来的豪迈之气：“我们生在现代，固然没有墨守陈例旧说的义务，可是我们实有采取古今所有成就来作我们新事业的始基的权利。”九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感发人心。

今天的创作者，也许能从韩兰英和她的时代寻找故事。一种讲法，是将“宫廷”“女诗人”“知制造”等元素堆积起来，塑造出与一些艺术作品中上官婉儿形象接近（“寒素精英”、年老遭难等等，坚韧感、上进心、主体意识与悲剧色彩）、颇具戏剧性的女主角。不过，同样素材，也可以塑造出悉从君命、身不由己的弱女子。别集失传，史传简略、他人著作里仅存一二軼事，使得韩兰英的故事阐释空间极大，可以容纳相反假说并存。

《南齐书》透露的信息似乎更为微妙。该书未设《列女传》，但有文学、良政、高逸、孝义、幸臣等类传，且《孝义传》男女合传。以韩兰英之文采，本可入《文学传》。《南齐书》一面将《文学传》置于类传之首，一面将才学兼美的韩兰英，只作为“有特殊性”的宫廷女官，附于萧颯妻后之下，事迹寡淡如一生无波澜。《孝义传》男女兼载，但《文学传》不可以；同列《诗品·下品》，丘灵鞠、卞彬、陆厥诸人入《文学传》，但韩兰英不可以。

比起故事内容，记载方式似乎更加意味深长，也给了后人阐释空间。

相较通过君主乳母或其他贵戚身份接近皇权的女官，韩兰英似乎更像“官员”，也被称为“公”：寒素获得进身之阶，往往也需依靠文学（至少“笔”，如

公文写作方面的）才能。但除了钟嵘将她与男性诗人同列品第，恐怕也只有萧颖之可能认为，永明政界不乏人物，文坛更是群星闪耀，而她的竞争力依然超越性别。对韩兰英个人，这似乎还是有些遗憾。

可能确如史书所说：长辈跟前，萧昭业有不少自我矫饰的本领。他人笔下顽劣叛逆的少帝，却仿佛对韩兰英的话真切信任。带些乖巧的依赖，宛如寻常少年对长者：

齐郁林王时，有颜氏女，夫嗜酒，父母母之，不出，入官为列职。帝以春夜酒后官司仪兰英为颜氏赋诗，曰：“丝竹犹在御，愁人独向隅。弃置将已矣，谁怜微薄躯。”帝乃还之。（《金楼子·箴戒篇》）

女诗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接近终点。即席而咏的一首应制诗，把另一“入宫为列职”的女子送回民间，也将成为她唯一传下来的作品。（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文匯學人

第510期